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划时代文献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

张 炯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划时代文献。今天,当我们纪念它发表七十周年的时候,愈益感到它的重要性和深远的理论影响。

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人民为社会主义未来而斗争的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半个多世纪来,人民革命风起云涌,世界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历史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几经曲折的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中,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范例,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热切关注!文艺历来与政治存在密切的关系。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跟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相伴而起,相伴而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新时代的文艺发展曾有过许多论述,在文艺本质论、文艺创作论、文艺功能论、文艺发展论、文艺生态论、文艺批评论等方面对文艺理论做过深刻阐明。《讲话》虽然发表于1942年的陕甘宁人民革命根据地,由于它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的新经验,面对了当时革命文艺所出现的新问题,它不但继承和发挥了此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而且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对此后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文艺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话》着重阐明的是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历史上的文艺,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基本上都是为少数统治阶级及其利益服务的。而当世界进入为争取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年代,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

题,必然成为关系文艺历史方向的根本问题。《讲话》提出文艺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不仅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也基于新的历史时代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列宁早就指出,文艺必须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但如何为的问题,结合实践去做理论上的透彻阐明,正是《讲话》的新贡献。《讲话》对文艺与现实生活,艺术美与现实美,文艺与政治,完美艺术形式与革命政治内容,文艺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创作主体的世界观与艺术方法,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创作中的歌颂与暴露,以及人性与阶级性等系列关系问题,都做出辩证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诸多规律,并使文艺如何为人民的问题得到系统性的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阐明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政治、文艺内容与形式、文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讲话》一方面反复强调现实生活是文艺创造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要求作家艺术家一定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以保证自己的创作源泉不致枯竭;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文艺与现实生活、艺术美与现实美的区别,提出艺术美可以也应该高于现实美的论断,认为艺术美应该“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反映存在又反作用于存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既充分重视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又指明主体对于客体的依存,从而对能动反映论美学和文艺是审美意识形态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辩证阐明。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历史上既密切又复杂。《讲话》既指出两者关系的密切,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又能“反过来给予伟大影响于政治”,又指出两者的区别:“政治并不等于艺术。”分别提出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要求文艺作品“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又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正因此,绝大部分文艺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如孙中山所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它更不能不涉及每个人的权益。文艺家总要生活在一定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府管理的社会之中,文艺家本人也总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信仰以及相应的感情爱憎,并或明或隐地表现于自己的创作中。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受制约于政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自然,文艺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丰富多彩,并非所有文艺作品都有政治内容,都能为政治服务,但许多文艺作品又确能为政治服务,没有政治内容的作品也并非一定没有政治作用。因此,邓小平鉴于历史经验,申言为避免政治对文艺的不适当干预,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时,又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讲话》所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政治矛盾空前尖锐的年代,那是符合历史现实的。《讲话》要求文艺家分清是人民的进步的政治,还是反人民的反动的政治。这对于所有文艺家来说,都是十分必要

的。到了和平建设年代,历史环境和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关系发生变化,在新的时代,不具政治内容的娱乐性文艺产品会增多,这类产品只要审美趣味健康,有益于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和社会稳定,总体上也符合这时期的根本政治目标,即社会主义的利益。全面认识文艺与政治又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仍然十分重要。

文艺作品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形式,从根本上说,正是由内容决定的。而文艺内容总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性,它通过影响读者的思想和行为而作用于社会及其文化思潮,乃至经济基础的变革。《讲话》既重视文艺的完美艺术形式的创造,同时,又十分重视文艺的思想内容,而为此,又强调文艺家必须解决世界观和主观思想情感问题,主张文艺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并在深入人民的斗争中,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改变自己与革命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旧的思想感情。《讲话》还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些都涉及作品内容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在阐明对于我国和外国的传统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借鉴的同时,还提出要反对“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与他建国后强调艺术创新,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一致的。

在当今中国,我们要做到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很大程度上就是正确处理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使我们的文艺

作品能够深刻反映时代的现实,表现促进历史进步的思想内容和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并勇于拓新文艺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从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术需要,激励和鼓舞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美好未来而斗争。因而那种只强调创作主体的作用而拒绝深入生活的观点,那种混淆文艺与政治的区别,要求一切文艺都为政治服务或笼统主张文艺脱离政治的观点,那种轻忽思想内容而单纯追求形式的观点,或者只事“横的移植”,轻视“纵的继承”,不求民族形式和特色的“创新”的观点,都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情感客观地存在多种倾向,这就更加突出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重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要性。特别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向全球扩散和渗透的历史情境下,不同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斗争仍然尖锐,我们就必须格外重视文艺产品的思想内容的先进性,重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提倡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由于《讲话》多方面揭示了文艺的规律,特别是文艺如何为人民的规律,它一发表就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但影响到解放区和全国的文艺,而且新中国成立后被奉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指针,并被许多国家翻译过去,对世界革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纪念《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更要深入学习和发扬《讲话》的精神,以促进我国文艺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开拓性贡献

郑伯农

回顾100多年来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变革史,人们可以看到,中国革命、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艺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革命的任务特别繁重,面临着唤起民众的重要任务,十分需要用文艺来点燃人们心中的火焰。近100多年来,文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是文艺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正因为和民族、和人民命运的密切联系,才造就了它的辉煌,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文艺家和文艺作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研究文艺问题,分析了人类文艺的一般规律,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特殊规律,提出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在《讲话》和毛泽东的其他文艺论著中,理论和方针政策是融为一体的。理论是指导思想,是对客观规律的概括;方针政策是对行动的要求,是对实践的具体规定。理论的科学性保障了实践的正确性,理论和方针政策的结合,决定了这种理论不是书斋之谈,它是紧密结合实际,从实际中来又反过来指导实际的理论。

毛泽东文艺思想首先解决的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纲领问题。那么,这个纲领是什么?“五四”、左联都没有明确解决过。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为大家的问题,但左联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讲话》明确指出,革命文艺的首要问题是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也就是方向和道路问题。为实现工农兵方向,必须走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包括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走和人民相结合的道路,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以為起码以下四点是具有重大开拓性的。

一、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艺的总体目标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艺的目的不在自身,而在于社会。它要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利用。人民是文艺事业的主人公,文艺要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团结人民、鼓舞人民,为实现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帮助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

二、他第一个提出,为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关键在于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观察、体验人民的生活,从生活中获取源泉,把普通的生活典型化,创造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典型形象。在毛泽东看来,深入生活不仅为了获取创作素材,还为了解决立场和思想感情问题。文艺家要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和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表达人民心声的作品。

三、新文艺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1944年,毛泽东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革命文艺家创造出大量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优秀作品。可以说,掀开了人类文艺史上的崭新一页。

四、毛泽东系统阐明了文艺工作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五四”前后,出现了对传统文化全盘推倒的极端倾向,

譬如废除戏曲,废除旧体诗,废除中医,废除春节,文字拉丁化,等等。正是毛泽东纠正了民族虚无主义偏颇,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很好地总结,很好地继承。可以说,对中外遗产的学习继承、分析批判,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树立的好学风。针对文坛上盛行的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的风气,毛泽东强调,文艺要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要有鲜明的民族形式,外国的好东西可以移植,但要和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在毛泽东看来,群众化和民族化是分不开的。只有树立鲜明的民族特色,文艺才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还有许多新开拓,仅以上几点,意义就是十分重大的。它开拓了中国文艺的一个崭新纪元,在人类文艺史上也有重大意义。

《讲话》不但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今天仍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为什么人,这仍是今天文艺事业的首要问题。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把赚钱作为文艺的根本使命?这是摆在许多文艺单位面前的尖锐问题。前几年,有人提出,商品是文艺的本质属性,过去忽视文艺的商品属性,是“左”的突出表现。笔者以为,某些文艺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带有商品属性,但不能认为商品属性就是文艺的本质属性。文艺的载体可能被买卖,优秀的作品则不可能完全被私人所占有。一首好歌,一首好诗,人们欣赏它,把它记在脑子里,不用花钱买,也不可能拿来出售。优秀的经典,都是社会的共同财富。现在,文艺的商品性被无限夸大,不但艺术品,连有的艺术家的良心也可以成为商品。重新贯彻《讲话》精神,对于端正文艺界的风气,是大有好处的。

电影文学界纪念《讲话》

本报讯 (记者高昌)近日,电影文学界人士聚集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中国作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活动。何建明、李准、仲呈祥、王晓棠、于蓝、董刚、阎晓明、王兴东、艾克拜尔·米吉提等200余人与会。他们认为,《讲话》至今闪耀着永恒的思想光芒,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形势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下的影视工作者应该高度重视剧本创作,必须坚持《讲话》精神,深入生活。剧作家及所有影视工作者都要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作为必修课,更好地了解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反映生活。

活动期间,积极践行《讲话》精神并取得丰硕成果的著名编剧于敏、史超、梁信、艾明之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苏叔阳被授予杰出贡献奖。他们分别创作的《高歌猛进》、《秘密图纸》、《红色娘子军》、《护士日记》、《夕照街》等著名作品,已成为新中国文艺百花园中的绚丽奇葩。

年过九旬的史超将军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满意的剧本,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最熟悉的生活。生活不是吝啬鬼,只要向它索取,它就会把五光十色展示在你的面前。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它的灵魂,是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科学论断。这种论断,至少包含了八个相互联系又层层推进的重要部分:其一,要以为人民而创作作为根本的“立足点”;其二,要把“人民生活”看做重要的创作源泉;其三,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其四,要把人民大众作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加以表现和讴歌;其五,为“便于”人民接受,要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其六,文艺作品要“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其七,“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其八,把文艺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即社会效果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成败得失的最终标准。如果说《讲话》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这种系统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开拓和推进,那么,《讲话》提出的社会效果论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新的生长点。

《讲话》诞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代,但因为深入把握了进步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讲话》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科学论述包括社会效果论的基本精神是穿越时空的,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正因如此,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在明确提出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我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之后,在一系列重要文艺文件中反复强调:包括文艺部门在内的一切精神生产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在这个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直至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又明确重申“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2011年11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九次文代会和第八次作代会的讲话中同样强调“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些都是和《讲话》精神一脉相承的,并赋予社会效果论以新的时代内涵,为当代我国文化事业、文艺体制改革、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在中央的正确指导下,我国文艺工作在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中所取得的历史性巨大成就就是有目共睹的,越来越多的文艺家、文艺单位自觉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又力争实现两个效益统一的行动进一步证明了社会效果论的正确。无须讳言,在国内外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下,在创作主体和艺术生产、传播单位的纷繁多选择中,也出现了一些颠倒两种效益关系乃至曲解“社会效果”本身的主张和做法,需要认真加以辨析。笔者在这里结合对《讲话》的重新学习,尝试分析一下两种主张。

有一种主张说:“作品是给人看的,票房价值、收视率就是效果,票房价值、收视率越高就证明社会效果越好。”我以為,这种说法首先抹煞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根本区别:如马克思所说,在物质产品的交换中,价格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浮动,“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但在精神产品的交换中,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价格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在当前我国文化市场中价格与价值背离、逆反、倒挂现象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怎么能将票房数字、收视率与社会效果等同起来呢?进而言之,《讲话》所讲的社会效果,并不是指一个作品究竟有多少人看,而是指人们看了作品后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即读者和观众看了作品后精神上行动上有什么变化,精神境界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行动更积极了还是变消极了。《讲话》中讲得很清楚,最好的社会效果就是“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文艺作品社会效益的目标是“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当代中国文艺要成为激励人民前进的力量”。试问,那些专门靠感官刺激、庸俗搞笑的烂小说和烂片,那些专门消费历史和经典乃至把楚汉相争归结为刘邦和项羽争夺虚名的“作品”,那些用挑逗做法引得全场狂欢叫吼的演出,它们中确实有不少赚足了票房和收视率,但它们在读者和观众的精神上行动上产生的是什么影响?能指望它们去提高民族素质、激励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吗?无疑,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被搞得如此混乱,根本原因在于有些人已经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立足点。

另有一种主张说:“评奖就是对社会效果的一种评价,凡是获奖作品都是社会效果良好的作品,是对社会效果的盖棺定论。”是的,评奖是对文艺作品的一种社会评价,在通常情况下,多数获奖作品的社会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但是,不能把评奖中获奖与社会效果完全等同起来,更不能盖棺定论。其一,评奖过多过滥的情况依然存在,有些未经统一规范的评奖,在评委会组成、评选标准和评奖程序上都存在问题,获奖作品经不住社会检验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二,即使在中央主管部门统一规范的评奖中获奖,还要看获得的是作单项奖、重要单项奖还是次要单项奖(包括技术奖),有些获奖次要单项奖特别是技术奖的作品,整体的思想艺术质量和社会效果并非都好。其三,有些参加评奖的作品系刚刚面世,获奖只是评委们的一种判断,包括获奖的作品在内,不一定每个获奖作品都能经得起此后“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的检验,经不住检验乃至惹出麻烦的事例并不鲜见。其四,在国外评奖中获奖就更加不能一概而论。人所共知,因文化立场和政治背景的不同,有些评奖专找我国主管部门没有审查通过和人民群众批评的作品给奖,目的就是挑战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民族尊严,能说这些作品的社会效果都很良好吗?

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成败得失的最高和最终的标准,真正的社会效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作品在广大读者和群众的精神上行动上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能否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种真正社会效果的实现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还要建立科学的监测方法,以防止被收视率和各种评奖牵着鼻子走。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重温《讲话》的科学论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效果这个最高检验标准,更好地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

坚持以社会效果为最高标准

李 准

时 评

『为什么人』依然是今天文艺的根本问题

董学文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了。七十年来,它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指引着中国革命文艺前行的航程,同时也像一块真理的礁石,越敲打撞击越闪烁出耀眼的花火。

《讲话》中的许多话语,今天重新读来,依然感到精准、适用和深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确实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用活了。

笔者认为,《讲话》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归根结底是由其理论功绩造成的。这种功绩,可以把它概括为三条:一是彻底地解决了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二是高度重视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对文艺创作的功能与价值;三是创造性地揭示了作家艺术家审美情感实现的新方法和新途径。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人类文艺思想史上,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都是带有原创价值的。

不过,这些问题的解决须得有个前提,或说须得围绕个中心,这个“前提”和“中心”就是要先弄清楚我们的文艺是给谁服务的?用《讲话》的说法,即“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对此,《讲话》给出的答案是:“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群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里的“首先”二字,既深刻又辩证,因为它把“为什么人”中的一般与特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等问题,都合理地解决了。《讲话》一方面讲文艺要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一方面讲“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这样,也就避免了片面性。

学界有人反感和非议这个“首先”,那多半是出于误读和曲解。众所周知,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某些精神匮乏、内容空虚,脱离生活、价值倾斜、缺少理想、境界低下的倾向,一些作品散发着过度的商业气息。这表面上看是由作家艺术家素质造成的,但深究起来,无不是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的结果。从这类文艺作品的背后,我们是不难透视和辨析出它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想掩饰也掩饰不住。这就是“为什么人”问题的“根本”性和“原则”性之所在。

在市场经济、阶层分化和、物欲横流的条件下,我们的文艺还要不要表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不要表现社会底层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文艺的服务对象还应不应当包括他们?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重读《讲话》,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